

《二十一世紀》於1990年10月創刊，正值中國和世界經歷重大轉折的年代。本刊以中國的文化建設為使命，期望在蘊釀、推動思潮方面發揮些微貢獻。三十年匆匆過去，世界再次進入不確定的時代，如何在前所未見的變局下思考中國文化的前景，仍然是本刊無時或忘的夙願。為慶賀創刊三十周年，將於10月號出版紀念專刊，邀請一眾編委惠賜鴻文，以誌留念。

——編者

蘇蒙關係研究的比較視角

谷繼坤的〈1920年代後期的蘇蒙關係——以「雷斯庫洛夫事件」為中心〉（《二十一世紀》2020年6月號）一文在兩方面提供了新知識。首先，在一般印象中，蘇聯與周邊衛星國的關係是單方面和壓倒性的，並且似乎一貫如此；而谷文指出這種壓倒性的關係其實經歷了從弱到強、由虛到實的建構過程——蘇俄對外蒙古的控制起初是有限的，建立在與當地進步民族主義者結盟合作的基礎上；這些民族主義者出身上層，並不認同蘇俄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莫斯科進行或明或暗的抵制；直到共產國際借「雷斯庫洛夫事件」對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層進行換血，該黨才成為蘇聯的工具。其次，谷文也揭示了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複雜關係——蘇俄在國際主義名號下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實際是莫斯科對舊帝國邊陲實現重新控制的手段；通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過扶持來自外蒙古社會下層的幹部（「農村派」），蘇俄不僅打擊和取代了原先的民族主義運動，而且實現了外蒙古在經濟、政治制度上的蘇維埃化。

然而，谷文需要更多的比較視角。根據作者的描述，蘇蒙關係雖然有些衝突，卻仍然是張力最有限的案例。莫斯科只經過一個回合就打倒了外蒙古的舊領導層，建立了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牢固控制。這樣簡單直接的改造遠不能與蘇中、蘇朝、蘇越等關係的錯綜複雜相比，也是蘇俄對烏克蘭、外高加索、中亞的控制過程所不具備的。蘇聯早期的革命輸出是一個地理上的連續過程，從沙俄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延伸到周邊各國。這些革命輸出並非同等順利，其中一些經歷了嚴重挫敗（比如土耳其和中國）。兩個要素的交互作用能解釋這樣的變異：一個社會在文化上距離俄羅斯本部愈遠，布爾什維克就愈難從內部找到熟悉當地情況的幹部，對這個社會的判斷就愈教條化和不準確；同時，一個社會被主要列強、敵對國家干預程度愈高，蘇俄也就愈難打開局面。

同理，蘇俄對於推動下層民族主義來加強控制，也存在

多種方式。比如，在中亞進行了大規模重新劃界和民族發明，創造沙俄疆域內所沒有的新國家體系；相反，外高加索三國則是以聯邦名義集體加入蘇聯。介於二者之間，外蒙古的模式反倒更接近蘇聯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做法——大體遵循原有的領土和民族概念，建立單一制國家。這些政策之間的差異和聯繫，關係到現代帝國形成的經驗和學習過程，值得進一步探究。

周陸洋 美國羅德島

2020.6.13

東北抗聯史研究之反思

東北抗日聯軍老戰士、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東北組組長韓光在1984年寫就〈現在可以說了——回顧解放戰爭中旅大地區支援前線的情況〉一文，他慨歎：「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三十多年，在回顧東北人民解放戰爭勝利進程的時候，這段重要史實是不能任其埋沒的。當年限於客觀歷史條件不宜公開說的和需要保密的一些事情，現在可以說了，應該如實說出來了。」但由於不少檔案資料依舊塵封或僅限「內部使用」，一些著述繼續遵

循「內外有別」的原則，所以現在的東北抗聯史尚未「如實說出來」。

首先，需要內部資料的解密開放。除了1955年東北軍區司令部編寫的《東北抗日聯軍歷史資料》和1988至1993年出版的《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外，東北抗聯史中最珍貴的資料當屬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以及80年代，當年在滿洲省委及東北抗聯隊伍中倖存的數十位高級幹部留下的訪談記錄與自述材料。但這些檔案作為內部資料，一般學者難以查閱，學界也難覓蹤迹。

其次，必須將東北抗聯史的研究置於抗聯史學史之中。七十多年的東北抗聯史研究、撰述歷程就是中共中央在不同時期認識抗聯、給抗聯史作結論的一部歷史。郝江東的〈析論抗日戰爭後東北抗聯史研究的特徵與走向〉（《二十一世紀》2020年6月號）一文即是此類研究的典範，梳理了抗戰後東北抗聯史研究的脈絡與特徵。

1982年，李延祿曾說過：「對東北黨史的研究，過去不是沒搞，而是沒研究下去，中斷了。……反高崗，把張作（秀）山反出來，這項工作就停止了。1959年彭德懷下台，林彪當了國防部長，他下令不准搞抗聯鬥爭史，要搞他在東北的歷史，結果誰也不搞。」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東北抗聯史研究深受國內政治運動、高層領導好惡以及中朝關係的影響；之後的三十多年，研究才步入正軌，逐漸走向學術化。東北抗聯史的研究道阻且長，但行則將至，期待學界共同努力！

張民軍 長春
2020.6.23

外蒙古公投的合法性焦慮

中國學術界對外蒙古獨立問題的研究成果車載斗量，但白林的〈大國博弈的產物：1945年外蒙古獨立公投探微〉（《二十一世紀》2020年6月號）一文仍有特殊的價值和貢獻：一是依據俄蒙檔案對牽涉外蒙古公投程序及進程的史實發掘；二是對外蒙古當局和蒙古人民革命黨策劃整個公投過程的主體性描述。事實上，學界對於外蒙古獨立公投和蔣介石政權關涉外蒙古問題的決策過程已有深入研究，白文在這方面並無突破。其主要貢獻在於作者所說的「梳理外蒙古獨立公投的過程，並着重回答……外蒙古獨立公投結果的『百分之百』是如何產生的」。

白文的主題深度亦有可拓展的空間。已有研究表明，在世局和時勢影響下，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已無法挽回，付諸公投不過是蔣介石給自己「下台階的理由」。然而，與外界普遍認為公投只是走過場不同，外蒙古當局事實上嚴陣以待，不僅提前做了充分的宣傳和動員，而且整個公投過程亦是大費周張。儘管漏洞百出，最終還是拼湊出一個「百分之百」的公投結果。這一史實引發了兩個疑問：其一，誰是公投大戲的實際策劃者？其二，為何要尋求「百分之百」贊同獨立的公投結果？不回答這兩個問題，就無法理解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國家，其面對的複雜政治形勢和無所不在的安全困境。

關於誰主導了外蒙古獨立公投，一直有個說法是「蘇聯操縱了公投」。包括喬巴山在內，外蒙古領導人原本並不贊同獨立公投，只是在蘇聯壓力

下才改變了立場。但蘇聯在公投過程中起到何種作用，現有俄蒙檔案均未能提供進一步的說明。可以確定的是，立場改變後的外蒙古當局以相當積極的態度投入到公投籌備和運作當中。白文還原的正是這一歷史場景。值得深思的是，「百分之百」公投結果的出現，雖然有可能是外蒙古一元體制下基層權力機構明哲保身的結果，卻更有可能是外蒙古當局的主觀意願，有確保政權合法性的深層意涵。在複雜的外部形勢下，外蒙古獨立要面臨合法性的長期考驗，獨立公投可以為政權增加一層保護色。

事實上，蔣介石政權一直視外蒙古獨立為雅爾塔體系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一部分，在與蘇聯關係惡化後，即迅速撤回了對外蒙古獨立的承認，控訴獨立公投無效，但最終未能奏效。此外，喬巴山和蒙古人民革命黨還面臨執政合法性的考驗。根據蘇聯檔案，全民公投實際上是對該黨權威性的一次檢驗。其能否獲得人民大眾的認可，是否有能力組織一場大規模運動，都有待考察。對喬巴山來說，「百分之百」公投結果意味着黨的權威和黨對民眾的影響力；意味着外蒙古人民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構建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或許在更為隱秘的層面上，他還試圖利用公投結果來限制蘇聯對外蒙古的過度滲透或控制。總之，外蒙獨立公投和「百分之百」公投結果的意涵需要進一步剖析和闡釋。

張楊 杭州
2020.6.15